

汉语个体量词产生过程构拟

北京语言大学速成学院 100083 李先银

College of Chinese Intensive Study of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Li Xianyin

内容提要：通过构拟汉语个体量词产生的历时演进过程，我们得出以下结论：（1）个体量词是模仿“一斗酒”的格式产生的，是形式类推促动的，（2）“枚”和“个”变成通用量词发生在个体量词演进的不同阶段，是为了满足表达需要的一种语言借用，而不是语法化的结果。（3）汉语的个体量词为什么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的选择机制在起作用。

关键词：个体量词，形式类推，构拟，借用

0、引言

现代汉语是一种量词型语言，数词与名词的结合必须通过量词的引介，古代汉语不是这样。古代汉语最初没有个体量词，个体量词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历史发展过程。目前学界对汉语量词的研究很多，主要集中在：（1）对某个或某些个体量词的共时和历时研究，（2）对某个时期或某部著作中个体量词的考察和描写，（3）对汉语个体量词产生原因的探讨，（4）对个体量词与名词的匹配的研究，（5）其他量词型语言中的量词研究及与汉语量词的对比分析。

以上研究集中在对汉语个体量词的个案研究，静态描写比较多一些，解释少一些。对个体量词产生的整个历史过程及其原因的探讨更是较少有人研究，这也导致人们对汉语个体量词的产生及其发展过程与原因有一些错误的认识。比如认为“枚”和“个”用作量词是虚化或语法化的结果。

本文在分析古代汉语文献和其他量词型语言资料的基础上，采用构拟的方式还原汉语个体量词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时在构拟的过程中，尝试解释汉语个体量词为什么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而不是别的情况。因此这项研究是描写的，也是解释的。汉语个体量词的产生和发

展以及量词系统的最终确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量词研究中的很多问题，特别是难点问题，只有放到整个历史进程中去考察，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比如“枚”为什么别借用作通用量词？“枚”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量词形态标志？为什么会产生新通用量词“个”等等问题。

为了叙述方便，本文按照构拟的个体量词产生历史过程的时间顺序，分7个部分。

- 1、形式类推与最早的汉语个体量词的产生
- 2、拷贝名词填补句法形式空位
- 3、“枚”借用作通用量词
- 4、量词生产机制的竞争与最终确立
- 5、量词系统的建立
- 6、新通用量词“个”的兴起
- 7、余论

1、形式类推与最早的汉语个体量词的产生

上古汉语有两种表量的格式，分别对应于离散名词和连续名词¹。

A：数词+ 量词+连续名词

B：数词+ 离散名词

A式和B式都是表量的，属于同一个语言范畴，即数量表达范畴，但形式是不同的。连续名

词数量表达必须借助于量词来完成，量词有容器量词、度量词和集体量词²。如：

¹ 古代汉语的表量格式存在两种语序：“数词+名词”和“名词+数词”，为了论述清楚，这里不考虑语序。实际上，语序对个体量词的产生和发展没有影响。

² 汉语的很多度量词是从容器量词发展来的，如：升、斗、斛等。

一簋食，一瓢饮。 (容器量词) (《论语·雍也》)

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 (容器量词) (《孟子·告子上》)

当秦之隆，黄金万镒为用。 (度量词) (《战国策·秦策》)

贝十朋³。 (集体量词)

马五十丙⁴。 (集体量词)

离散名词以独立的自然个体形式存在，可以直接计数，因此表量可以不需要量词的帮助。

上古汉语里，离散名词的表量采用“数词+名词”的形式。如：

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书·吕刑》)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书·召诰》)

齐为卫政，伐晋冠氏，丧车五百。 (《左传·哀公十五年》)

那么，理论上讲，个体量词对于离散名词的表量是不必要的，那么汉语为什么要产生出个体量词？

我们认为，汉语个体量词的产生是形式类推促动的结果，目的是达到A式和B式形式上的一致。一致化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1、语言内部的动力：语言范畴化。语言范畴化要求：一种语言中表达同一或相似的功能或意义，如性、数、格等，一般会采取相同或相似的表达形式，2、语言外部的动力：民族思维和行为习惯。一个民族的语言，是该民族思维特征的表征，它应该反映民族思维和民族习惯，同时，一个民族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也会对语言的编码规则产生影响，特别是形式方面的影响。汉民族特别重视“形式”的“统一”，这在汉民族的制度、艺术、建筑、行为习惯等多个方面都有表现。

³ 该例转引自王力(1989)。古代以“贝”为币，十贝为一朋。甲骨文里存在大量用例。

⁴ 该例转引自王力(1989)。“马”的个体量词是“匹”。“丙”是马的集体量词，若干马叫“一丙”。甲骨文里存在大量用例。

那么，现在我们来再看古代汉语表量的两种格式：

A：数词+量词+连续名词

B：数词+离散名词

这两种格式是不一致的，它们的不同表现在A式有量词，B式没有量词。下面的例子能更清楚地看出这种不一致。

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国语·越语上）

“酒”是连续物体，表量必须借助容器量词“壶”来实现，因此形式上，“二壶酒”中数词和名词不是直接加和的，在数词和名词中间有容器量词“壶”；“犬”和“豚”都是离散名词，表量不需要量词的帮助，因此“一犬”、“一豚”在形式上是数词和名词直接加和的。

语言的范畴化和汉民族要求“形式统一”的心理，要求汉语名词表量的两个格式达到形式上的一致。可能的解决办法有两种：1、去掉A式种的量词。实践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连续名词不可能独立存在，表量必须借助于容器量词、度量词或集体量词，也就是说，A式的量词成分是不可缺少的，不可能去掉。正因为如此，A式在语言使用者的心理上会成为优势格式，即数量表达的范式。儿童语言习得证明，儿童是把“数+量+名”作为一个整体结构识记的，儿童语言的早期用“个”去填补空位（丁凌云1999）。2、在B式上添加一个量词成分，实现与A式形式上的一致，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当A式成为语言使用者心理上表量的表达范式的时候，语言使用者的集体语感中会类比地认为B式存在一个形式空位。即：

A：数词+量词+连续名词

B：数词+ +离散名词⁵

用某个成分填补了这个空位，A式和B式就达到了形式的统一。

在语言实践中，语言使用者开始了多种填补空位的尝试，如个体量词、拷贝名词以及借用

⁵ 这里“ ”表示一个形式空位，也就是说，实际形式是空的，但在人们的心理上或者表达范畴上存在一个成分。

“枚”做通用量词等。这些尝试在实践中竞争，有的发展了，有的被淘汰了。

最早的尝试发生在最常用的离散“名词”上，如“马、牛、车”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物体上，这样就产生了最早的个体量词“匹、头、张、个”等。如：

丘出马一匹，牛一头。 《司马法》

子产以帷幕九张行。 《左传·昭公十三年》

负服矢五十个。 《荀子·议兵》

不过那时候产生的个体量词数量极少，不能满足表达的需要⁶。

2、拷贝名词填补句法形式空位

“匹、头、张、个”等个体量词的产生，说明语言使用者已经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尝试，因为“马、羊、牛”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使用频率非常高，客观上进一步加强了A式的心理优势，使A式成为一个集体语感里的完形。但是个体量词极少，在一个句子里边，如果有的名词有量词，有的名词没有量词，形式上很不统一，遇到这个情况怎么办？短期内生产大量量词是不可能的，一个临时的解决办法就是拷贝名词填补空位⁷。在殷墟卜辞里，就发现了在数词后面拷贝原来的名词填补量词空位的例子。如：

(1) 羌百羌。 比较：羌十人。⁸

(2) 人十有六人。

⁶ 据王力（1989），先秦之前的个体量词只有“匹、乘、两、张、个”等极少数的几个。

⁷ 游顺钊（1988）认为拷贝名词是记忆的需要，他并没有给出合理的证明。我们认为这是不合适的。

⁸ 殷墟卜辞中既有“羌百羌”这样拷贝名词做量词的例子，也有用“人”做通用量词的例子，说明当时人们填补空位的尝试有多种的。实际上，“人”作为通用量词也是从拷贝量词发展来的，这从例（2）能清楚地看出来。

西周金文也有类似的例子。

(1) 玉十玉。

(2) 田十田。

(3) (执兽) 三人，获耳或四千八百□二耳，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俘马□□匹⁹，俘车两，俘牛三百五十五牛，羊二八羊。(小孟鼎，35下)

例(3)特别有说服力，“马”和“车”有专用量词“匹”和“两”，而“人、牛、羊”还没有，为了达到形式上的一致，就临时拷贝名词做量词。这也证明：(1)在语言使用者的集体语感里，“数+量+名”的范式确实存在，(2)拷贝名词做量词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目的就是填补空位，达到形式上的统一。

不仅汉语，其它量词型语言也都存在拷贝名词的现象，而且有的今天还在使用(梁敏198

3、徐悉艰1994、李宇明2000)。如：

泰语： to²⁸.lek⁸ to²⁸ nuŋ⁵ 一张小桌子

桌 小 桌 一

老挝语： hɔ:ŋ³ sa:m¹ hɔ:ŋ³ 三间房间

房间 三 房间

哈尼语： a⁵⁵nu⁵⁵ tɕhi³¹ nu⁵⁵ 一颗核桃

核 一 粒

⁹ 这里“□”表示此处汉字残缺或不可识别。

拷贝名词只是一个临时的填补空位，达到形式统一的解决办法，不可能成为汉语量词的发展方向。这是因为：（1）“数+量+名”范式中的空位需要的是一个量词，拷贝名词虽然能满足形式上的要求，但不能满足对“量词”类上的要求，（2）拷贝名词会造成句法结构识解上的困难，特别当语序演变成“数+量+名”后，就变成了“数+名+名”，识解的困难会更加明显。（3）拷贝名词会造成一个名词用一个量词，很不经济。（4）拷贝名词不能反映人们对名词范畴化的成果，这一点后边还有详谈。所以拷贝名词只能出现在量词发展的早期，是一种临时的小范围的句法尝试，因此用例只在殷墟卜辞和西周金文中有极少量发现，此后的文献中的用例已经没有了。可以认为，拷贝名词填补空位是一种失败的尝试。

在今天仍然使用拷贝名词作量词的语言里，都存在拷贝名词被通用量词或者专用个体量词代替的发展趋势（李宇明2000）。这符合我们构拟的个体量词发展的一般规律。

3、“枚”借用作通用量词

3.1“数+量+名”要求一个成分填补空位，而且这个成分功能和形式上都应该是一个量词，专用的个体量词不可能短期内产生出来，拷贝名词也不是好的办法，于是汉语和汉语使用者尝试了一个更好的替代解决方案：借用。借用一个词做所有物体的量词，即通用量词，来填补数量表达格式中的句法形式空位¹⁰。

理论上讲，有很多词可以作为候选，比如已经发展成为个体量词的“个、头、张、匹”等，都有可能被选择。除此以外，其它的名词也可能被选择。

那么借用哪个词？借用的标准是什么？根据语言借用的原则，这个标准应该是：（1）被

¹⁰语言的借用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手段，语言之间有借用，如日语的汉字、韩语的汉字都是借自汉语，再如状语的量词，100个量词有90个以上是汉语借词，占总数的90%。其中，表示度量衡单位和货币单位的量词全部来自汉语（覃晓航2008）。语言内部也有大量的借用现象，如汉字的转注和假借。

借用的词应该是很普通很常用的，（2）被借用的词使用频率应该很高，（3）被借用的词应该与要表达的内容具有某种关联性，或者是形式上的，或者是意义上的，或者是类属上。就数量表达来说，被借用作通用量词的词应该已经经常用于计数和计量。

综合以上的标准，“枚”就是这么一个候选人。它完全符合语言借用的标准：（1）“枚”的意思是树枝，这在古代非常普通、常见，而且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2）“枚”使用频率很高。

（3）“枚”上古时期就已经广泛用于计数和计量。

3.2下面我们来看看古代汉语中的“枚”。

《说文解字》说“枚，干也。从木、从又。”《诗·周南·汝坟》有“伐其条枚”，意思是“折取树木枝条”，《毛传》：“枝曰条，干曰枚。”但是“枚”并不是粗粗的树干，而是细小的较硬的树枝。这样的树枝很容易获得，也很容易改造成为工具“小木棍”。从古代文献上看，在上古时期，作为“小木棍”的“枚”已经成为“占卜的工具”和“计数的工具”。如：

枚卜功臣，惟吉之从。（《尚书·大禹谟》）

微以戒之，南蒯枚筮之。（《春秋左传》）

左骖迫，还于东门中，以枚数鬪。（《春秋左传》）

孔颖达认为：“枚是筹之名也”，也就是段玉裁所说的“枚数之枚”，进一步引申就有了“识其枚数”的用法¹¹。我们推测：古人用“小木棍”的“枚”推演八卦，《易经》里的八卦符号☰阳爻“—”和阴爻“--”就是长短小木棍的写实符号。在中国古代先民的生活中，占卜和计数（数数）是重要而经常的活动，而“小木棍”是很容易得到的，并得到广泛应用。因此，“枚”有机会从“计数”进而发展成长度单位。

十分寸之一谓之枚。部尊一枚。弓酋广四枚，酋上二枚，酋下四枚，酋深二寸有半。

（《周

¹¹ 参见陈绂2002

礼·考工记》)

这里“枚”已经发展成为长度单位。

正因为“枚”已经广泛地应用于计数和计量，在需要时借用来做“临时通用量词”是最自然的选择。这能合理地解释为什么“枚”能突然用作除人以外的所用物体的通用量词。

3.3 从文献上观察，“枚”用作量词有两个特点：1、大量用例的突然出现。2、使用范围的突然扩大。

先秦文献中没有发现“枚”用于量词的用例，只在《墨子》中出现几个用例，但一般认为《墨子备城门》以下诸篇是后人做的，因此不可信（王力1989、张万起1998）。汉朝文献和简牍中出现大量的“枚”用做通用量词的用例，使用范围包括“除人、树木以外的几乎所有名词”，可以用于植物、器物，甚至动物的通用量词（王力1989、张万起1998、陈绂1998、2002、李先银2002等）。如：

木器髹者千枚。 （《史记·货殖传》）

若寡人国小也，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万乘之国而无宝乎？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请干将铸作名剑二枚。 （《吴越春秋》）

中有里药二枚。 （《汉书·外戚传。》）

小杯一枚，中盘三枚，小盘十三枚，案四枚，铺比一枚。 （《居延汉简》）

剑一枚。 （《居延汉简》）

刀一枚。 （《居延汉简》）

斧一枚。 （《居延汉简》）

以上“枚”用作量词的用例都发生在汉代中期（公元前二世纪到前一世纪），而且用例非常大，使用范围非常广泛。这种现象不可能是虚化或者语法化的结果，因为：（1）虚化或者语法化一般都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如“跟”、“片”、“条”的语法化都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任何一个词都不可能一下子发展出一系列的派生意义或虚化意义，而“枚”用作通用量词是短期内出现的。（2）虚化或者语法化的意义都是从词语的本义开始发展出来的，而“枚”作为量词并不是从形状的“细而长”开始演进的，典籍中找不到“枚”从“树”开始演进的路径。事实上，古代汉语中，“枚”作为量词极少用于“树木”。（张万起1998）

因此我们认为：“枚”用作通用量词是语言的借用。汉语临时借用“枚”来填补形式空位，达到两种表量格式的形式一致。

3.4 与拷贝名词相比，借用“枚”作通用量词是一种更好的尝试，因为“枚”确实是一个量词，既满足了形式上的要求，也满足了空位对量词类属的要求。“枚”的借用也证明，在语言使用者的集体语感中确实存在“数+量+名”的数量表达范式，语言的使用者是在有意识地寻找合适的方法填补空位，在个体量词产生的早期，对形式的关注高于内容和意义，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形式是外在的，更显著，更容易观察到，也更容易把握。所以，拷贝名词、借用“枚”做通用量词都是首先从形式方面考虑的尝试。

3.5“枚”的衰落也进一步证明了“枚”是借用，不是虚化或者语法化的结果。

“枚的”衰落伴随着专用个体量词的增加而逐渐衰落的。当汉语的量词系统建立起来以后，借用的通用量词“枚”的衰落就是必然的了。因为：（1）大量的专用个体量词产生后，必然会逐渐取代“枚”，这样“枚”的使用范围就会越来越窄，并最终消失。（2）“枚”的作用就是补位，当这个作用完成了，它的历史作用就完成，退出是必然的。（3）“枚”的书面语体色彩也会使它失

去活力。这时候口语中新通用量词“个”的出现也挤占了“枚”的生存空间。语言的新旧更替是必然的。

“枚”的衰落分两方面：一是使用范围的缩小，一是用例的减少。

借用“枚”做通用量词发生在汉朝初期或更早，“枚”可以用于除了“人”和“树木”以外的几乎所有名词，植物、器物，甚至动物都用“枚”，“枚”的使用范围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张万起1998；刘世儒1961、1965；黄盛璋1961）。如：

又能吞刀剑数千枚。（《神仙传·孙博》）

而鬼应声接矢数枚，皆倒入土中。（《搜神记》卷16）

太守赐良鰽鱼百枚。（《东观汉记》）

只，鸟一枚也。（《说文解字》）

取蜘蛛一枚，着饭中，吞即愈。（葛洪《治疟方》）

唐宋时代，“枚”还有比较大量的使用，只是使用范围和用例已经减少。

从“枚”搭配对象上看，魏晋南北朝“枚”可以与78种名词搭配，唐五代81种，元代9种，明代15种（参见叶佳柳2005；叶佳柳、刘炎飞2008）。

“枚”的衰落另一个变化是用例的减少，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枚”的应用非常广泛，有大量用例。唐宋时代，史书、散文中“枚”还在广泛使用，但唐诗中的用例已经极少见，张万起（1998）考察了唐代30位诗人的诗集作品，只在王志梵的诗集中找到2个用例，其它29位诗人作品均未见。元代以后“枚”的使用范围大大缩小，张万起（1998）考察了元曲约50万字的材料，只发现4个用例，只局限用于针、钿盒、簪子等器物的量词。明朝长篇小说《水浒传》1-20回“枚”只有3个用例。清长篇小说《红楼梦》只有1个“枚”的用例，还是沿袭传统的用法。

于是写了方子……大枣二枚。（《红楼梦》第10回）

对比个体量词发展的情况可以看出，“枚”是伴随着专用个体量词的增加而逐渐衰落的，“枚”的使用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广泛，两汉有个体量词30多个，魏晋南北朝大概发展到120个，唐宋时期，汉语的量词系统确立，“枚”的使用范围缩小，用例减少，并逐渐消失。这说明“枚”临时借用为通用量词填补数量表达形式“数+量词+名”中的“个体量词”空位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伴随着富有特征的丰富个体量词的产生和投入使用，“枚”衰落乃至消亡就是必然的。

4、量词生产机制的竞争与最终确立

4.1 前边我们讨论了，汉语表量有两种格式：

A：数词+ 量词+连续名词

B：数词+ 离散名词

为了实现表量格式形式上的一致，在形式类推的促动下，汉语开始了三种填补句法形式空位的尝试：（1）拷贝名词，（2）借用“枚”作为通用量词，发展成为唯一的量词甚至量词标记，（3）生产专用的个体量词，如匹、头、个。前边我们讨论了拷贝名词不可能发展成为汉语量词的最终形式。

那么“枚”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汉语的唯一量词，取代已经产生出来的专用个体量词，甚至进一步发展成为量词标记？我们认为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1）“枚”只是临时借用的量词，当更多的专用个体量词产生后，它的任务就完成了，必然要退出，（2）在借用“枚”的同时，汉语也在两条腿走路，同时生产专用个体量词，两汉已经有专用个体量词30多个，（3）“枚”不能反映人们对物体范畴化的认知结果。虽然个体量词的产生初衷只是为了满足形式上的需要，

但是客观上也起到了对名词范畴化的作用。随着更多专用个体量词的产生和使用，人们已经认识到个体量词对名词的范畴化作用。也就是说，随着个体量词的发展，量词被赋予更多的功能：除了填补空位，实现完形，还要个体化名词，范畴化名词。（4）汉语已经找到了合适的个体量词批量生产机制，就是提取形状特征的量词生产机制在竞争中获得了胜利。“枚”的应用并不适合这个机制。

汉语个体量词的发展有三条路：前边我们证明了汉语不可能选择前两条路，只能走第三条路：生产专用的个体量词。专用个体量词既满足了形式补位的要求，也满足了意义上对后边的名词范畴化的要求，这是一条有前途的发展方向。

4.2 汉语个体量词生产机制的竞争

既然汉语选择了生产专用量词，那么生产大量的专门量词不可能是无序的，需要一个统一的生产机制，这个机制必须是能产的。

早期的个体量词产生的机制是不一致的，比如“牛、羊”用“头”，来源于“牛头、羊头”的凸显地位，“帷幕”用“张”来源于“帷幕张开的形状”，“矢”用“个”来源于古代的“矢”是用竹子做的，而“马”用“匹”的理据目前不是很清楚。不管早期量词产生的机制怎样不同，一个共同点是这些量词和匹配的名词有某种联系，或者是形状上的，或者是材料上的，这是思维范畴化的反映。

在长期的量词生产过程中，提取形状特征的量词生产机制在竞争中获得胜利。原因是：

（1）离散名词的最大特点是空间性，具有独立的自然形状，对物体形状的范畴化是一种简单而又有效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的人对物体形状的认知和归类的水平相当高，在名词概念的形成中大量采用了形状标准，如“又细又长的树枝”为“条”，“木别生条”为“枝”，“细的树干”为

“枚”，古人对不同形状的树枝用不同的名词来表示。造汉字也采用了形状特征，如象形字，“日、月、人”就是它们形状的描摹。汉字是一种形象化的文字，汉语也是一种形象化程度很高的语言。（2）心理学研究证明，认知上对物体形状的把握是比较容易的。儿童语言习得也证明，5：0前儿童话语中的个体量词多与名词所指事物的形状或某些简单特征相联系（丁凌云1999）。（3）量词要和名词有一定的关系。选择符合名词形状特征的名词做量词，能很好地反映量词对名词范畴化的成果。古人根据形状把“树枝”区分为“条、枝、枚”，这些词都发展成为量词，这个现象不是偶然的。其他量词型语言都存在大量形状量词，如彝语诸语言中普遍存在形状量词，各语言所表示的类别、形状也大体相同，主要有圆粒形、长条形、扁片形、块形等（徐悉艰1994），（4）容器量词和天然集合量词都是基于物体的形状产生的，如升、斗，后者如“胡取禾三百廛”（《诗经》）的“廛”，这对个体量词的生产机制的确立有很好的示范和借鉴意义。

4.3 我们再看汉语的几个例子：

条

《说文解字》说“条”是“小枝也”，它的形状特征是“又细又长”。先秦已经引申有“长”的意

义。

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 《尚书·禹贡》

那么用“条”发展成为“细长类”事物的量词是相当自然的，如用于“路、绳子”的量词。

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 （班固《西都赋》）

紘一【条】属两端于武，纁不言皆，有不皆者，此为袞衣之冕。 （郑玄注《周礼·弁师》）

条属者，通屈一【条】绳，若布为武，垂下为纁。 （郑玄注《礼记·杂记》）

颗

“颗”的本义是“小头”，《说文解字系传》直接点明了“颗”的用法：“今言物一颗，犹一头也。¹²”后来“引申为凡小物一枚之称，珠小曰颗，米粒曰颗是也”（《说文解字注》）¹³，后来圆形体积小的物品就都可以用“颗”来做量词了。如“一颗花生”“一颗图章”“一颗子弹”等。

块

它的本义是“土块”，以后泛指一切块状之物，如“一块表”“一块砖”“一块砚台”等。

4.4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汉语里和植物树木形状有关的名词大多都发展成为个体量词了，如条、枝、枚、个、根、本、株等。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认知上语言使用者总是借用常用的、普通的东西来说明复杂的、罕见的物体。树木普通，到处都是，与古代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们对身边树木的观察是细致的，因此对树木形状的归类会进一步扩展到对其他物体形状的归类上。考察其他量词型语言，也都是选取能表明名词形状特征的词用作该名词的量词，如傣语，条状物体用 sin^3 ，支架状物体用 laŋ^1 、块状物体用 kən^3 ，圆状或丸状物体用 met^8 和 noi^5 （罗美珍2007）。

5、量词系统的建立

汉语个体量词从无到有到建立完备的量词系统，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唐宋时

¹² 《说文解字系传》是五代南唐时期的徐锴为《说文解字》做的传。

¹³ 清代著名文字音韵训诂学家段玉裁为《说文解字》作注，称作《说文解字注》。

期，汉语建立了完整成熟的量词系统（李先银2002）。其标志是：

(1) 量词的使用成为句法上的强制性要求。数词不能直接和名词结合，必须通过“量词”的引介。李艳惠、石毓智（2000）有一个统计，反映了汉语使用“个体量词”在强制性方面的发展。

文献	年代	数+名	数+量+名
世说新语	5世纪	88%	12%
敦煌变文	9世纪	75%	23%
朱子语类	12世纪	40%	60%
老乞大	14世纪	1%	99%

句法上强制要求使用个体量词，一个前提是必须要有合适数量的个体量词保证使用，也就是说，必须保证每个离散名词都有合适的个体量词。而唐宋时期，已经发展出了一定数量的个体量词，保证了对名词的完全覆盖。

(2) 有合适数量的专用个体量词。提取物体的形状特征竞争确立为专用个体量词的生产机制，这个机制具有能产性。语言使用者通过形状特征把名词二次范畴化，一类名词选择一个量词，这样既减少了量词的数量，又满足了形式和意义上的要求，同时客观上也增加了语言表达的形象性。

专用个体量词的生产机制最终统一，形状化特征机制获得最后的顺利，那么按照这个机制的建立的生产线，生产了大量专门量词。两汉生产专用个体量词30多个（黄盛璋1961），《史记》有个体量词38个（方琴2005），到了魏晋南北朝，个体量词发展到了120多个（刘世儒1961）。南北朝时期量词词量的丰富，分工的细密，规范的明确，标志着个体量词的发展进入了成熟期（刘世儒1965）。唐宋时期，汉语的专用个体量词达到300多个，加上新通用量词“个”的使用，已经达到对名词的完全覆盖，也就是说，所有的名词都能找到合适的量词来称量。合适数

量的个体量词的生产，保证了句法上强制使用量词成为可能。

(3) 有高效的量词生产机制，即形状特征机制。这个机制具有高能产性，也就是说，一旦有新的名词出现，语言也能按照这个机制很快生产出来新的量词和它匹配，如电视机，冰淇淋等新鲜事物出来后，这个生产机制马上就能生产出语言使用者都能接受的量词。

(4) 有新通用量词“个”。形状特征的量词生产机制不能覆盖到所有的名词，比如形状特征不明显的名词和没有形状的抽象名词，这时候必须借用一个新的词来保证对名词的全覆盖，汉语选择了“个”。

6、新通用量词“个”的兴起

伴随着量词系统的建立，一个新的通用量词“个”出现了。问题是：既然量词系统已经建立了，已经有能产的量词生产机制，已经有适量的专用量词，那么“个”为什么还会变成通用量词？

我们认为“个”也是被借用作通用量词的，与“枚”的情况一样，所不同的只是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借用的目的和动因不同。借用“枚”发生在汉语个体量词产生的早期，是为了填补形式空位的一种尝试。而“个”的借用发生在量词系统建立时期产生的新需要：伴随着量词系统的建立，句法上强制要求所有名词的表量必须使用量词，但是按照形状特征量词生产机制，有两类名词很难或者不可能生产出量词：一类是形状特征不明显的名词，如与“人”有关的名词，山峰等，很难生产出合适的量词，一类是抽象名词，根本没有形状，不可能依据“提取形状特征的量词生产机制”产生出个体量词。但是“数+量+名”格式又强制要求所有的名词必须有量词，解决的

办法就是找一个新的通用量词来代替。汉语选择了“个”，为什么是“个”而不是别的词？因为“个”有多个方面的优势。

(1) “个”已经用作量词，而且形状特征不明显，这一点非常重要。根据文献，“个”是“箇、個、个”的合流。先秦就有“个”，与“介”混写，用于“人”的量词。如“国君七个，遗车七乘，大矢五个”（《礼记·祖弓》）。“箇”本义是“竹枝”，先秦也可以用作量词，如“负矢五十箇”。“個”是后起字，可能因为“个”用于“人”的量词另造的。到汉末，这三个字就合流了¹⁴，“箇、個、个”的合流使“个”的发展空间无限扩大，一方面使“个”搭配范围扩大，不仅用于“竹”的量词，也用于“人”、动物等。能用于“人”的量词泛化的可能和动力非常大¹⁵；另一方面，“箇、個、个”合流成“个”使得“个”既可以用作人的量词，也可以用于“竹、矢”的量词，模糊了“个”形状上的特点，使得“个”有可能借用来做那些形状特征不明显的名词的量词，并进一步借用来做没有形状的抽象名词的量词¹⁶。汉语史的文献资料也证明，“个”的搭配对象的扩大正是沿着这个路径扩大的。“个”的搭配对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6种（刘世儒1965），唐五代是58种，主要用于形状特征不明显和抽象的事物，如“好笑事”、“话”、“是非心”、“拙见”、“消息”、“闲”、“成”、“恩”等。到了元代，“个”的打搭配对象更是扩大到鬼神、动物、建筑、器物、食物以及各种抽象物体，这证明，“个”是唐宋时期伴随着汉语个体量词系统的建立为了表达“形状特征不明显”和“没有形状的抽象”名词的需要而泛化的。

¹⁴汉末郑玄的《仪礼注》中存在大量“箇、個、个”混用现象，如“俎释三个”，郑玄注“个犹枚也，今俗言者物件云若干個者，此读然。”

¹⁵“枚”在使用范围最广泛的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几乎不能用于做“人”的量词。

¹⁶量词型语言大都存在通用量词，如彝语诸语言中，载瓦语的luu²，哈尼语的mo^{5t}，拉祜语的ma³¹，几乎能用于所有名词，但主要用于抽象名词和新出现的名词（徐悉艰1994）。

(2) 从使用的语体上看，唐以前，“个”已经在口语里较多使用了，如《说文解字》有“俎释三个”的句子，郑玄注：“个犹枚也，今俗言者物件云若干个者，此读然。”¹⁷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个”好像“枚”一样，今天的口语里说什么东西多少个。从这个注释里，可以看出几个问题：1、郑玄用“枚”来解释“个”，说明当时“枚”更加通用，而“个”还是一个少用的量词，至少书面使用上是这样。2、“俗言”就是老百姓的口语，这说明“枚”和“个”在语体上有分工，“个”当时只用在老百姓的日常口语里。3、在口语里，“个”的使用范围已经在逐渐扩大，一般的物体大概已经可以用“个”做量词了。也就是说，“个”首先在口语里开始通用量词化。

在口语里大量使用，意味着语言使用者对它比较熟悉，它的可接受度比较高。而且，口语里新产生的词一般生命力更强。文献资料也证明这一点。唐以前“个”并没有借用作通用量词，它只能用于人、某些动物和某些器物，“个”的书面用例也很少，书面上都是用“枚”，如《史记》和《汉书》中“枚”有107例，量词“个”只有5例。但是唐以后，“个”的使用范围和用例显著增加，根据张义（2008）的统计，《全宋词》用“枚”做量词103次，用“个”做量词331次，《全元曲》用“枚”做量词109次，用“个”做量词飚升到1039次。

(3) “个”能用于“人”。“人”在任何语言里都有显著性。能用于“人”一方面使得“个”变得很普遍，另一方面使“个”很容易扩展到与“人”相关的其他名词，如鬼、神、人体部位等。

下表展示了“个”用于“人”以及与“人”的名词的扩展过程¹⁸。

¹⁷ 参见郑玄《礼记注》。

¹⁸ 此表数据来自刘世儒（1965）、叶佳彬（2005）、叶佳彬（2007）。

时期	“个”与“人”相关名词搭配情况
魏晋南北朝	人
唐五代	客人、老人、情郎、儿子、鬼、佛、尸体、骷髅、齿、指头、身子
元代	人物、先生、神仙、妖精、口、指头、脸、拳、手、牙、耳朵、身材、筋斗、姜太公、李谪仙

魏晋南北朝时期，“个”只能与“人”搭配，唐五代，“个”还可以和鬼神、尸体等搭配，也可以与人体部位搭配。到了元代，这种搭配更扩展到表人的抽象名词，如“人物”、“身材”等上。这说明，“个”的扩展速度是惊人的。“个”扩展的时间与量词系统建立的时间是吻合的。

这一节我们做一个小结：“枚”和“个”的兴起都是语言表达的需要，只不过两种需要发生在不同的时期和背景下。“枚”和“个”的兴起是语言选择的结果，语言选择也适用“适者生存”的发展规律。

7、 余论

本文通过构拟汉语个体量词产生的历时演进过程，我们得出以下结论：（1）个体量词是模仿“一斗酒”的格式产生的，形式类推促动的，（2）“枚”和“个”变成通用量词发生在个体量词演进的不同阶段，是为了满足表达需要的一种语言借用，而不是语法化的结果。（3）汉语的个体量词为什么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是语言的选择机制在起作用。

汉语个体量词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典型的语言选择过程。汉语个体量词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在语言发展中具有类型学方面的意义。结合其他量词型语言的资料和研究，我们尝试把个体量词的发展过程归为几个阶段，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

（1）开始期

- a) 有少量个体量词。产生的动因是形式类推或其它语言的影响

- b) 量词的来源和理据多样
- c) 存在拷贝名词
- d) 量词的使用不具有语法的强制性，可用可不用，以不用为常

(2) 发展期

- a) 有一定数量的个体量词
- b) 形状特征量词成为主要的量词生产机制
- c) 存在类似于“枚”的通用量词，而且用例较多
- d) 量词的使用不具有语法的强制性，但以用为常

(3) 成熟期：量词系统建立

- a) 有合适数量的个体量词
- b) 形状特征的量词生产机制确立，具有能产性
- c) 量词的使用具有句法强制性
- d) 存在“个”这样的通用量词，主要用于抽象物体、形状不明显物体

上面量词产生阶段的划分只是一种理想的构拟，适用于所有的量词型语言。根据这些特征性，我们可以判断一个语言的量词处在哪个发展阶段，并对其今后的发展做出预测。同时我们也可以考察一个语言中的量词与汉语及其他语言的关系。有个体量词的语言，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或周边国家的语言，如日语、韩语、越南语，这些语言受到汉语的强大影响。它们中的很多量词也是借用自汉语。在100个壮语量词中，有90个以上是汉借词，占总数的90%。其中，表示度量衡单位和货币单位的量词全部来自汉语（覃晓航2008）。

参考文献

- 王 力, 《汉语语法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9年, 第18-40页。
- 徐悉艰, <景颇语量词的产生与发展>, 载《中央民族学院》, 1990年第2期
- 丁凌云, <儿童语言中的量词>, 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9年1期
- 徐悉艰, <彝语量词的产生与发展>, 载《语言研究》, 1994年第1期
- 张万起, <量词“枚”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 载《中国语文》, 1998年第3期
- 梁 敏, <壮侗语族量词的产生与发展>, 载《民族语文》, 1983年第3期
- 黄盛璋, <两汉时代的量词>, 载《中国语文》, 1961年第8期
- 刘世儒, <论魏晋南北朝的量词>, 载《中国语文》, 1959年第11期
- 刘世儒, <魏晋南北朝个体量词研究>, 载《中国语文》, 1961年第10、11期
- 刘世儒, <魏晋南北朝称量词研究>, 载《中国语文》, 1962年第3期
- 刘世儒, 《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年
- 张 义, <汉语通用量词“枚”与“个”的嬗变>, 载《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 2008年第2期
- 李艳惠、石毓智, <汉语量词系统的建立与复数标记“们”的发展>, 载《当代语言学》2000年
第1期
- 陈 纭, <谈汉语陪伴性物量词的由来及其应用原则>, 载《语言文字应用》, 1998年第4期
- 陈 纭, <从“枚”与“个”看汉语泛指性量词的演变>, 载《语文研究》, 2002年第1期
- 覃晓航, <壮语量词来源的主渠道>, 载《语言研究》, 2008年第1期
- 李宇明, <拷贝型量词及其在汉藏语系量词发展中的地位>.载《中国语文》, 2000年第1期.
- 游顺钊, >从认知角度探讨上古汉语名量词的起源>.载《中国语文》, 1988年第5期.
- 方 琴, <《史记》量词用法探析>, 载《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05年第4期
- 罗美珍, <汉、侗-泰、苗-瑶语声调和量词产生与发展的相同过程>, 载《语言科学》, 2007年
第6期

王绍新, <量词“个”在唐代前后的发展>, 载《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9年第2期

叶佳彬, <《六十种曲》与明代文献的量词>, 博士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 2005年

叶佳彬、刘炎飞, <从“个”和“枚”等三对量词的历时演变看汉语量词发展的机理>, 载《玉林师范学院学报》, 2008年第1期

李先银, <汉语个体量词的产生及其原因探讨>, 载《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2年1期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individual classifier in Chines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Li Xianyin

Abstract : By reconstructing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individual classifier in Chinese, This paper found that:(1)the individual classifier in Chinese started from imitating the frame “yi dou jiu” and motivated by analogy in form,(2) “mei” and “ge” was borrowed, not grammatized, as universal substitute classifiers to meet the expression need at different certain stage in the process,(3)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individual classifier in Chinese was dominated by the mechanism of language selection.

Keywords : individual classifier, analogy in form , reconstruction, borrow